

文化、权力与市井：惠州西湖“八景”空间形态及其社会教育功能构建

Culture, Power and Market: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of Huizhou West Lake and Their Social-Educational Functions

郎锦远¹ 孙启微^{1,2*}
LANG Jinyuan¹ SUN Qiwei^{1,2*}

(1.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桂林 541006; 2.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桂林 541004)
(1. School of Desig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China, 541006; 2.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China, 541004)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6)02-0091-09
DOI: 10.12193/j.laing.2025081100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5-08-11
修回日期: 2025-10-10

摘要

文化景观形态与功能始终反映并塑造着特定社会的文化认知与价值传递, 从文化景观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出发, 惠州西湖“八景”的空间形态营建机制及社会教育功能实现路径可从三个维度解析: 儒释道思想通过宗教场所与书院建筑的空间布局, 将伦理教化功能铭刻于景观之中, 构成社会教育的思想基础; 官方权力依托律令规制与纪念性景观营建, 实现意识形态的空间规训, 确立社会教育的制度框架; 市井活动则以日常实践重构景观意义, 拓展教育受众范围与实践路径, 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网络。这一机制展现出古典园林作为“非制度化社会教育”的独特属性, 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空间教化”的多元路径提供典型样本, 亦为当代城市近郊景观的文化传播与环境教育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

岭南州府园林; 八景; 社会教育; 空间育人

Abstract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consistently reflect and shape the cultural perceptions and value transmission of specific socie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landscape and social education,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path of realizing the soci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of Huizhou West Lake can be analyzed along three dimension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se philosophies inscribe the ethical educational function within the landscape through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religious sit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reby form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Official authority depends on regulator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numental landscapes to realize ideological spatial discipline and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social education. Market activities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the landscape through daily practice, expand the scope and practice path for the educational audience, and form an educational network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is mechanism shows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classical gardens as a “non-institutionalized educational field”, provides a typical samp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paths of “spatial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provides a historical mirror for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suburban landscapes.

Keywords

Lingnan multiple landscape; Eight Scenic Spots; social education; space education

郎锦远

2001年生/男/河北石家庄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岭南园林

孙启微

1983年生/女/黑龙江五大连池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空间研究、空间美育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2997344915@qq.com

古人常以“八”为名概称地域胜景, 形成“八景”文化传统。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编纂的“八景”名录, 其实际包含的景点数量并非固定为八。如明朝李玘修、刘梧编纂《惠州府志》所载为“八景”, 而明朝陈运《惠州西湖志》则增至十四景, 至清朝徐旭旦《惠州西

基金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广西民族村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耦合实践与路径研究”(编号: 23FMZ032);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空间生产视域下岭南州府园林的保护性设计研究”(编号: XYCS2025142)

湖志》扩展为十六景，吴騫《惠阳山水纪胜》去鹤峰返照、合江罗带、三台晓日、万壑松风四景，为十二景（表1）。这反映了后世编纂者会根据地域认知深化、景观变化及审美标准演进，对这份代表性景观名录进行动态调整，而非机械固守“八”的数量限制。本文研究的惠州西湖“八景”系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空间形态的生成与演变，蕴含着自然与人文、权力与教化的融合。

从社会教育的视角看，惠州西湖“八景”履行的是一种“非制度化教育”功能。它区别于官学、书院等正式教育体系，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融合，依托自然景观与文化活动开展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而这种非制度化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空间教化”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文化涵化机制得以实现。“空间教化”是指通过思想浸润、文化制约、道德规诫等非强制性方式，依托特定的空间场所与文化实践，引导民众形成符合社会秩序的认知、观念与行为^[1]。

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儒释道文化生态，为惠州西湖“八景”的社会教育功能奠定了思想根基。其中儒学南传通过书院讲学与先贤祭祀等制度化实践，将儒家伦理教化系统地植入地方社会价值体系。历代

文人对“八景”的诗词题咏，赋予自然景观以丰富的文化意涵，凭借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使伦理价值在审美体验中得以潜移默化地传递，持续强化着“八景”的社会教育功能^[2]。

从空间权力维度审视，唐宋时期地方官员主导营建并借此称颂政绩的州府园林建设模式，影响了惠州西湖“八景”的景观格局，构成“八景”教化功能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八景”的空间意涵并非仅由官方建构，随着惠州西湖从官员展示功绩的“山水客厅”逐渐演变为公共游赏之境，民众的商贸往来、日常劳作等市井活动不断浸润其中，为景观注入了鲜活的世俗意义。最终这种“自上而下”的规训教化与“自下而上”的市井赋意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八景”的多重身份；它既承载着官方与文人的文化理想，也映照民众的生活智慧。综上，本文通过梳理宗教教化场所的构建、书院建筑的人文溯源、州府园林的权力规训及世俗化进程中的风景历代的演进，探究惠州西湖“八景”的空间形态、营建机制与育人能效。

1 惠州西湖景观形态与社会教育功能相关研究

现有对惠州西湖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历史事件或文学赏析，缺乏从风景园林本体

出发，对权力、文化与空间形态互动关系的深入剖析。因此，本文主张从风景教化与现代教育视角切入，重点探讨“八景”文化对民众行为的塑造机制及其意象的公众理解路径。

1.1 教化论域：古代教化与现代社会教育

中国古代语境下的教化范畴涉及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传统影响，且被视为“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即便已有研究从阐释传播视角探讨“八景”教化作用，整体仍存在视角偏向与内容局限^[3]。传统书院作为古代教育组织形态，其核心育人思想体现为“环境教化”，将园林景观转化为教化载体，实现对士子德行的熏陶，并延伸至社会教化层面。现有研究对书院教化功能的探讨，过度聚焦文人主导的儒家文化传播，忽视岭南本土民俗文化、市井生活等教化表达；另一方面对教化空间的认知局限于书院、祠庙等狭义范畴，未能关联精英阶层与民众，缺乏对两者在教化过程中互动关系的探讨，社会教育的德育价值被忽视与弱化^[4]。德国社会教育学家第斯多惠，首次提出“社会教育”概念。其认为社会因素为教育基础，社会生活构成社会教育条件^[5]；社会

表1 惠州风景营建详情
Tab. 1 Details of Huizhou landscape construction

典籍 Classic	景观列表 Landscape list	新增景观 New landscape	景观更名 Renaming of landscape
明 李玘修、刘梧编纂《惠州府志》	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	—	—
明 陈运修《惠州西湖志》	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象岭云飞、合江罗带、黄塘晚钟、苏堤玩月、榜吟春霖、西新避暑	象岭云飞、合江罗带、黄塘晚钟、苏堤玩月、榜吟春霖、西新避暑	—
清 吴騫编《惠阳山水纪胜》 徐旭旦编《惠州西湖志》	丰湖渔唱、半径樵归、野寺岚烟、水帘飞瀑、雁塔斜晖、鹤峰返照、荔浦晴光、桃园春色、象岭云飞、合江罗带、黄塘晚钟、苏堤玩月、榜吟春霖、西新避暑、三台晓日、万壑松风	三台晓日、万壑松风	鹤峰晴照—鹤峰返照 山寺岚烟—野寺岚烟 榜吟春霖—榜岭春霖 荔浦风清—荔浦晴光 桃园日暖—桃园春色

教育需要使教育成为社会功能、文化成为社会变革力量以构建和谐社会。李自若等^[6]提出,风景园林专业可通过梳理重构景观资源、参与环境教育活动策划与环境营造,在自然教育活化文化景观中实现乡村景观建设资源整合。

1.2 空间论域：空间形态与功能

空间承载教育功能的研究已具有一定基础。西方“环境育人”理念由来已久,从夸美纽斯的直观教学到杜威“学校即社会”的主张,均强调物理环境对经验学习的关键作用^[7]。国内研究集中于两类空间:一是作为传统社会权力与文化资本核心载体的空间形态,如皇家园林、江南私家园林及传统书院。研究剖析空间如何通过山水格局、建筑题咏等手法,实现对士人阶层的审美与道德陶冶^[8]。二是现代城市公园、博物馆等公共非正式教育空间,相关研究关注其作为“社会教室”在终身学习、环境教育等方面的设计策略与功能^[9]。古典园林研究多聚焦精英文化而忽视市井民俗的大众教化维度,现代研究则与历史脉络脱节;此外对岭南州府园林这类融合自然山水、官方意志与公共功能的复合空间,其形态如何系统构建融合意识形态、道德教化与市民休闲的复合教育机制,尚缺乏深入揭示。

1.3 权利论域：景观营造与社会互动

从权力视角审视景观营造,是理解其社会形成机制的关键路径。国内相关研究揭示了权力的三种机制作用于景观。一是通过纪念性建筑、轴线布局进行视觉展示与权威象征^[10];二是通过法律规制与空间规划实施行为引导与社会规训,如历史律法对近郊山水公共属性的界定与管理^[11];三是公共空间作

为官方意志与民间社会互动、协商乃至博弈的场域^[12]。这些研究证实了权力在景观形成中的主导作用,但对“地方权力”的复合动机,融合贯彻中央意志、完成地方治理实务与联结地方精英网络,及其在具体营造中的实践策略,分析尚显笼统;现有视角常将市井民众视为被动接受者,忽视其通过日常实践对景观意义进行转译与重构的能动性。因此,诸如惠州西湖景观这类由官方主导营建、受律法规范且融入文化象征的公共园林,其教化功能实现,更应被视作一个由官方管治、精英诠释与市民日常使用共同参与的动态建构过程。

2 文教之源：儒释道价值体系的空间铭刻

在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管控力尚未充分渗透、行政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往往借助宗教的教化功能,将其作为辅助施行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13]。唐代以前城市管理已认识到园林在引导市民生活及促成“君民同乐”方面的作用,旨在使其成为城市治理与民众教化的载体。自唐代开始,岭南地区兴起了大规模的州城、府城营建,融合了官学、书院与佛教元素,发展成为多元文化空间。至宋代农业基建完善后,书院以其文化底蕴引文人驻足,进而提升书院影响力。明清时期儒释道教化场所形成完整体系,标志政教交融的成熟。

2.1 儒学伦理的景观化转译

唐宋时期岭南文化的转型为儒学伦理的空间表达提供了独特语境。这一时期岭南文化在谪贬文人、移民迁徙、外来文化传入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呈现“远儒尚朴”的特征,浓厚的商品意识源于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独特地理位置,使重商思想成为明清

岭南士人的常识理性。随着儒学南传,“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士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岭南社会经历了从士民二元到士民一致的文化整合过程。这一时期由发达商品经济催生的市民阶层,促使造园活动形成雅俗并进的格局。如陈白沙所言“鸢飞鱼跃,其机在我”,其重视现实体验的思想倾向,打破了传统“隐逸”观念的疏离感,推动岭南园林呈现出既恪守儒学伦理又包容市井趣味的在地气质,在文化生态下又催生了兼具教化功能与生活气息的景观体系^[14]。

2.2 释道精神的场所承载

《惠州开元寺记》中载,东汉时惠州西湖尚属“山犹林莽,狼虎宅之”的南蛮之地;汉献帝年间,佛教入岭南最早记载为僧人文简在惠州银冈岭西湖边设伏虎台;晋元帝时,惠州西湖有载佛教胜迹,湖上建龙兴寺,后至隋文帝时,该寺已成惠州“最胜之寺”,唐玄宗开元间更名为“开元寺”。北宋余靖写的《开元寺记》中描写这一带风景“重山复岭,隐映岩谷,长谿带幡,湖光相照”,即“黄塘晚钟”一景。禅宗因六祖惠能的影响在岭南盛行,园林周边兴建了大量禅宗寺观,如惠州西湖的“元妙观、永福寺”等。这些寺观与州府园林发展紧密关联,推动了文化融合与公共性特征的演进^[15](图1)。

唐庚谪居惠州时作《钟潭行》:“君不见惠州城之西,永福古寺钟崛奇”;明嘉靖进士翁梦鲤赞其“山藏古寺疏钟度,树隐人家独鸟飞”。古籍记载:“永福寺亭台楼阁隐于葱茏,景致清幽”,而后以“野寺岚烟”一景得名。“桃园日暖”因桃花为道教教花,景中有“元妙观”,为唐代纪念名僧,僧伽所建而得名。明代李学一《玄妙观》诗云:“寻幽直到玄都境”;宋代陈偁题“雁塔斜晖”;清代吴騫以



图1 《惠阳山水纪胜》所题的宗教建筑
Fig. 1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scribed by Huiyang Landscape Jisheng

图2 “八景”中的野寺岚烟、桃园日暖、雁塔斜晖图
Fig. 2 Among the “Eight Scenic Spots”: Wild Temple in Misty Hills, Sunny Warmth over Peach Orchard, and Setting Sun over Wild Goose Pagoda

诗画阐释；晚清张友仁引苏轼《江月五首》诗中“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一句改为“玉塔微澜”。通过描绘泗州塔等宗教景象、神话传说和诗词题记等媒介引导展开，“惠阳八景”中宗教场所相关景致已然形成^[16]。如图2所示，“野寺岚烟、桃园日暖、雁塔斜晖”图中均可看到相对应的宗教建筑。

2.3 人文景观的社会教育体现

宋代平民化城市带来的风景审美世俗化，更促使城市风景从“文人幽赏”演变

为“城市胜览”。惠州西湖组景是州府治理者与文人表达责任伦理、理想等公共理性的场域，也是官员治理地方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载体。其教化理念体现于建设主张与事迹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文人和地方官员将修身与治国理想相融合，既以“乐山乐水”寄个人感悟，亦重山水文化对民众的教化。惠州文臣通过兴修西湖、创作诗文促进地方教化，而主体的阐释使组景承载其公共理性，成为景观由物象转向价值教化的关键^[17]。

2.3.1 诗词题咏：景观意象的文本建构与价值传递

惠州西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文人、政客等在此留下大量诗文题咏，或载于纸帛，或刻于石碑，留存至今。唐开元年间，玄宗东封，有群鹤翔集其坛，于是诏令诸道观皆名“白鹤”，建在葫芦岭的白鹤观因此得名。东坡作《和陶移居诗》：“古观废已久，白鹤归何时。我岂丁令威，千岁复还兹。江山朝福地，古人我不欺。”所描绘的意境，正是“鹤峰返照”这一胜景。苏轼抵惠时，惠州西湖与东江相连，水不稳、交通难。他筑苏堤分平湖与丰湖，稳水域、通陆路，堤上植柳榕，酿出一方景致，后称“苏堤玩月”。清代惠州知府吴騫描述：“堤边修竹间垂杨，嫩绿繁荫夏景芳，飞阁窗开无暑到，蝉声唤起满湖凉。”苏东坡诗有“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由此“西新避暑”得名^[18]，人文景观如图3所示。

民国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木石书画类”统计，惠州现存最早与西湖相关的石碑，正刻为“惠州野史亭诗”，后雕“惠州重修西新桥记”，由南宋庆元二年惠州重建西新桥时，通判许骞撰文并勒于野史亭诗碑碑阴而成，遂成一碑两记之制。陈谨立《谒东坡先生祠》诗碑，刻有“玉署词章百代雄，惠阳人士仰文忠，池沼春云生丽藻，祠堂日暮锁垂虹”。表达了渴望追思先贤以及对其功绩的肯定。清嘉庆六年伊秉绶主政惠州，因崇仰苏东坡，书其《王朝云墓志铭》复刻刊石筑亭，供后人瞻仰；又聘“岭南才子”宋湘为重建后丰湖书院首任山长。伊秉绶所书“丰湖书院”门额及联语“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后人陈永正评“端庄厚重，笔意在颜、苏之间，无狂怪之态”，与他倡导的“敦重”学风相得益彰。

可见诗词题刻借描摹自然景观，融入人

文意涵以赋特定文化意象，尽显文人官员忠君爱民、“先忧后乐”、民生为先之质，文人乐观旷达、心胸宽广，同时托物言志，寄寓道德隐喻，将山水草木与品格德行相勾连，让观者在赏景中感知文化意涵与伦理指向。

2.3.2 书院营构：学统传承与精英教化的制度化空间

惠州太守赵汝驭在惠州银岗岭的开元寺内创建了聚贤堂，用于祭祀和纪念唐、宋以来对惠州经济文化有重大贡献的先哲名儒。祭祀活动与文教场所的营建作为风景中直接的教化载体，祠堂祭祀对象的选择，凝聚儒家伦常品质与人格光辉，旨在让学者有向往、知趋向，确定进德修业方向。例如，文惠堂祀陈尧佐，谥文惠；陈使君堂，祀陈偁领州事；还有韩侯祠、景贤祠、殷顾二公祠、窦公祠。祭祀关键在于认同、继承和发扬其学其道，学者可通过了解供祀对象的具体表现与抉择，受教育者可根据自身道德需求、兴趣偏好，自主选择德育内容深化对儒家伦理的理解认同。设祀是教育理想的具象化，倡导安贫乐道、进德修业以完善人格的德智教育，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指上行下效，以德化民与仁政的德智教育^[19]。

宝祐二年，惠州太守刘克刚将聚贤堂改为丰湖书院，宋初理学传入惠州，推动当地书院教育兴起。嘉靖二十二年，薛侃先于罗浮山青霞洞讲学，后迁至永福寺（拆惠州西湖西北岸永福寺西厢建惠阳书院，取代原丰湖书院，嘉庆初又废）传播阳明心学，促成惠州兴书院之风。徐旭旦《惠州西湖志》中的西湖总图可见（图4），教化场所均占据视觉焦点，足见州府对书院教学的重视。清代碑记明言：“治在贤才，人文之兴由教化，书



图3 “八景”中的鹤峰返照、西新避暑、苏堤玩月图

Fig. 3 Among the “Eight Scenic Spots”: Crane Peak with Sunset Glow, Cool Retreat at Xixin, and Moon Viewing on Su Causeway

图4 惠州西湖总图

Fig. 4 General map of Huizhou West Lake

院者育才之地，致治之本源。”州府借山水景胜、祠堂祭祀、书院讲学等配套设施，系统性地传播儒家经典、地方文化，培养士人阶层，并辐射影响社会风气。

明清时惠州西湖书院鼎盛，嘉庆五年宋湘为书院山长，其亲题的书院正门石刻“丰湖书院”门额及“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对联至今犹存。其后邓承修、梁鼎芬力倡文章、道德、气节，除修复建筑，还向各地名流贤吏征集藏书四万余卷，于书院西建三楹书楼书藏“四部略备”。经历代经营，丰湖书院规模日扩、影响渐深，成为惠州最高学府及岭南著名书院。这一时期当地学术文化得

以发展，惠州籍著书立说者达130余人。惠州书院历代培养出大批科举人才，唐至清光绪元年，计有进士146名、举人922名、诸科79名、岁贡2 871名。有人仕至省或中央级高官，也有人担任各地中下级官员，他们多勤政履职，身居要位却清廉自守、杜绝私情。他们以身作则，更以自身品行影响后辈，使正直守礼、好学向进之风在民间蔓延，促进了地方崇廉尚勤、重教兴文的风气形成^[20]，使教育成为社会功能、文化成为社会变革力量来构建和谐社会。

清代为岭南书院全盛时期，办学数量增多，以便让文人讲学、育后学、续学统。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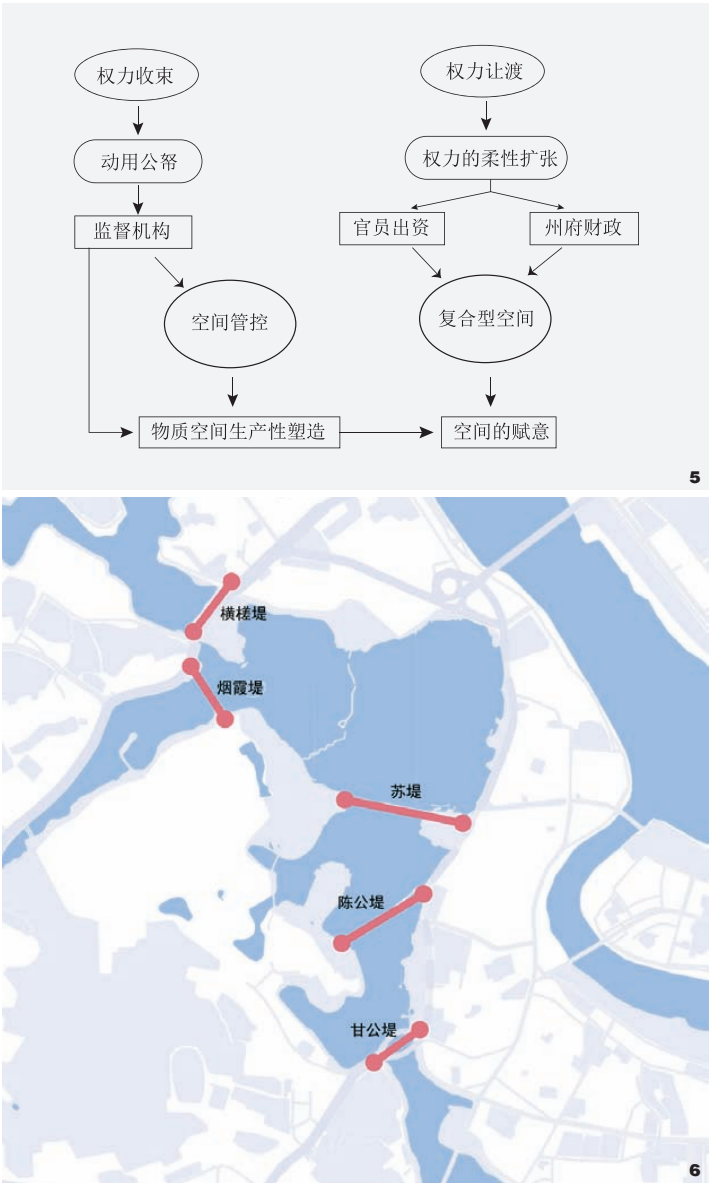


图5 权力管控关系图
Fig. 5 Power control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6 路堤划分西湖水域图
Fig. 6 Map of the water area of West Lake divided by embankment

代典籍多合作编纂，文人合作意识与凝聚力渐成，为建构地方学统与学术凝聚力奠定坚实基础^[21]。

3 权力之塑：州府主导下空间的权力规训

岭南社会发展集中体现于唐宋之际经济社会的快速演进这一历史节点，至明清已成就南国富庶之境。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变迁对于岭

南园林史研究而言有着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据刘管平先生就岭南园林的历史分期与园林特征的研究，唐宋时期是岭南州府园林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11]。

3.1 政绩驱动下生产性景观与民生教化的结合

水利设施的兴修与州府园林生产性功能的空间塑造有着直接联系，深刻关乎地方百姓生计与治理效能，因此宋代将水利建设纳入官员考核体系^[22]（图5）。以元祐四年推行的四善三最标准为例，四善要求官员具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四项品德，三最侧重考核赋税管理、农桑水利、治安抚民等实务能力。这种考核机制促使地方官注重治理能力的提升，抑制工程贪腐与资源滥用等行为^[23]。

州府官员常以与民同乐为理念赋予其建设的公共属性，以州府财政、官员捐款、邑人集资等形式为园林修建提供财政支持。在惠州西湖的建设历程中对官员与文人在水利、民生、文教等领域所创下的功绩进行赞颂，期冀通过历史典范的树立，对后世为官者予以规训与引导^[19]。

水面是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构成要素，其形态直接决定整体空间架构的景观层次；而西湖曲折多变的湖岸形态正是塑造丰富多元空间层次的基础（图6）。宋代陈偁筑陈公堤、明圣桥，解决早期堤防问题；苏东坡修堤造堰划分特色水域，通过九堤、八岛、六桥的划分，形成5处大小形态各异的水面。官方通过水利治理干预水面形态，塑造“八景”空间骨架，承载文人对景观韵律的审美追求，为文化教化与市井活动提供场域；又满足民众游赏动线需求，最终以教化综合体形态承载社会教育功能^[24]。

3.2 权力规训下自然山水景观的塑造

“合江罗带”于惠州西湖东麓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两江交汇形成蜿蜒如罗带的河道形态。惠州知府陈偁主持修建堤坝、加固堤岸等工程，苏东坡修建两桥一堤，塑造了稳定的河道形态，与合江楼的人文建筑相互映衬，构成“二江合处朱楼开，碧水萦洄绕岸来”的独特景致。“三台晓日、榜岭春霖”两景因岭南独特的地理特征而得名，明代诗人陈运曾以“叠嶂幽岩锁碧空，翠微常在水光中”描绘其云雾与山色交融的意境。“三台晓日”位于惠州西湖西侧三台石及周边山体群，清代《惠州府志》有载：“象岭蜿蜒如象，晨暮云气往来，若象鼻吸水，首尾皆活。”可见自然山水影响审美文化心理，从自然崇拜到礼赞再到推崇审美价值，风景欣赏是教化民心的直接方

式。《唐律疏议》等条文中规定禁止乱采伐树木、破坏山野物产等行为，保障了惠州西湖中的植被完整性，为“万壑松风”一景提供了山峦连绵、松林茂密的生成条件；还因其相关律法明确规定禁止随意开采山石、截断水源以及乱砍滥伐周边植被等破坏行为，保障了形成“水帘飞瀑”所需的地理地貌和水源供给的稳定性。这种“以自然为宗”的审美观，讲求契合天地之真、日用之真、性灵之真，反对雕饰穿凿、艰深冗杂，主张率性而言、真挚自然^[22]，赋予惠州西湖山水植物生机之态，寄寓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与文化意向。

4 市井之融：空间秩序转变与世俗教化路径的拓展

唐宋变革推动宋代城市文明转型，城市功能从行政主导转向商贸娱乐优先，与汉唐“礼治为主、经济为辅”的秩序不同，宋代城市完成了从行政型向商贸娱乐型的转变。坊市制度瓦解，开放式街巷取代严格时空管制，市民生活与活动获得自由。平民化与世俗化进程加速，使得州府城市近郊成为雅俗共赏的生活场域^[25]。

4.1 近郊风景世俗化倾向：公共空间与市民生活的兴起

宋代公共游赏呈现空前勃兴之态，明清时期公共游赏更趋鼎盛，民众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外对山水审美的诉求日渐提升，这一趋势促成自然山水开发建设的推进。

清代岭南园林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特征，惠州西湖景观的形成深植根于民间生产生活与人文传统之中，其文化特质承袭了岭南的世俗性与务实性，城市发展进程中西湖的核心特征渐趋凸显，一方面是教化功能的



图7 “八景”中的荔浦晴光、半径樵归、丰湖渔唱图

Fig. 7 Among the “Eight Scenic Spots”: Breezy Serenity by Lychee Bank, Woodcutter's Return on Half Path, and Fishing Songs over Feng Lake

图8 惠州西湖“八景”位置及类型分布示意图

Fig. 8 Location map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of Huizhou West Lake

强化，另一方面是世俗化特质的深化^[26]。儒、释、道三家择址山湖胜境设研学教化之所，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岭南城郊风景成为教化载体的基本前提，也是“八景”形成发展的动力。

4.2 市井活动与景观赋意：民间智慧的教化参与

惠州西湖的形成，始于宋代兴堤筑桥、蓄泄湖水、溉田有鱼等利于民生之措施，使

民食其利，物阜其生。兴水利之役，既促农副之繁荣，兼得如画园景。刘管平《岭南园林》一书中提到“荔浦之风益清，薄雾凝霏，素月流空，渔樵藉舟楫之便，呈现一片湖之丰，渔之乐”，惠州西湖是民众生产生活的资源基础。明代《修平湖堤记》载“鱼虾产育，菱芡布叶。舟艇网罟……渔歌樵唱”，《西湖采菱记》《水晶鱼说》等文献翔实记录了渔业农耕场景。惠州西湖的动植物资源，承载着民众持续的自然开发活动，维系着传

表2 “八景”景观类型与建筑
Tab. 2 Types of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Eight Scenic Spots”

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景观列表 Landscape list	宗教建筑 Religious architecture	书院、祠庙 Academy and temple
宗教景观	桃园日暖、黄塘晚钟、山寺岚烟、雁塔斜晖	桃园日暖——元妙观 山寺岚烟——永福寺 雁塔斜晖——泗洲塔 黄塘晚钟——开元寺	丰湖书院、聚贤堂、黄塘寺、永福寺、元妙观
生产实践活动	荔浦晴光、丰湖渔唱、半径樵归		
人文景观	苏堤玩月、西新避暑、鹤峰返照		—
山水自然景观	水帘飞瀑、象岭云飞、合江罗带、榜岭春霖、三台晓日、万壑松风		

统农业社会的运作根基^[27]。

杨万里《惠州丰湖亦名西湖》有“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之句，李仲昭亦作“画卷西风绕旧游，此身疑尚在杭州”。古代文人对惠州西湖美景曾与杭州西湖有着相似的评价。王瑛《代泛亭记》“溪谷幽深，殆胜于杭湖片水，一览可尽者也”“杭湖，吴宫之西子也；惠湖，苎萝村之西子也”，凸显惠州西湖区别于杭州西湖，兼具西湖文化共性与岭南地域特性。

州府园林与城市水利、游赏休憩、祭祀祈福、教化育民等核心功能均紧密关联百姓生活。风景以“苎萝西子”著称，风格素雅、烟火气浓厚，“荔浦风清”“半径樵归”“丰湖渔唱”等景点展现农业盛景充满市井气息（图7）。薛侃在《西湖记》中提出：“湖之胜，众人得之娱其意；幽人得之和其德，达人得之惠其政。”惠州西湖作为公共性空间“众人可享”的胜景^[28]，映现古人参与建设的侧面。岭南丰茂，樵民自黄响山打柴归来，荷薪行于丰湖堤上，欢歌与渔唱相融，随波荡漾，这种生产实践本身即最本质的教化。具体空间分布与景观类型可参见惠州西湖“八景”位置及类型分布示意图（图8）。可见宗教景观多系于寺观、祠堂、书院之属，人文景观常缀以文人雅士行迹之痕，二者沿西湖岸线错布；市井景观则

与民众耕织、游憩等生产生活实践相系，自然景观则关联与天然地貌之间。“八景”的景观分类具体详情见表2。

5 惠州西湖“八景”社会教育功能的整合机制

官方的制度规范、士绅的文化赋意、宗教的精神转译、民众的生活实践，这些元素通过深层的整合机制实现了功能的协同与效能放大，成为持续塑造道德伦理与文化认同的社会教育空间。

5.1 多元教化主体的协同与张力

惠州西湖“八景”的教化功能，是官方权力将士绅文人的文教传统与宗教团体的精神导向纳入统一教化框架，通过景观的物质形态与文化符号，实现对民众认知引导、行为规范再到价值认同的分层教化。教化的核心是官方价值观念的下放，传递“八景”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依托形成过程中主体的公共阐释作用^[10]。多元教化主体的协同中，官方权力为制度性阐释的主导者，通过定期修编方志、颁布政令，以资源调配权主导“八景”的价值阐释方向。依托书院、祠堂、寺庙等公共机构掌控传播渠道，使“仁政”“勤治”等理念借助景观叙事代代相传。官方以治绩为“八景”奠基，士绅以诗文为其赋意，官方将文化建设纳入治理体系，士绅以文化实

践回应政治需求，宗教团体虽非公共阐释的核心主体，却以上施下效的方式对官方与士绅所宣扬的理念进行转化传译。这种转译虽不直接参与核心阐释，却扩大了教化的受众范围，让底层民众通过信仰接受价值观念。民众作为阐释的接受者与践行者，通过参与“官民游赏、祭祀祈福”等风俗仪式，将抽象价值转化为生活实践，是对“和睦、勤勉”等价值观念的生活化演绎^[29]。这使官方与士绅的公共阐释落为日常的行为习惯，进而使市井文化、山水风景成为价值传递的最终载体。

5.2 多维教化路径的交织与渗透

宋代以来，岭南官宦常借景观呈现治理成效，通过构建“以景鉴政”的教化逻辑，规训官员思想内化为施政目标，使“八景”的存在成为激励官员勤政善治的隐性教材^[30]。以祠堂祭祀、书院讲学、民间传述将“八景”的空间叙事转为通俗化教材，引导民众向往正直守礼、见贤思齐的品格，促成社会风气的正向发展，推动重教的蔓延。杜牧《江南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勾勒出南朝宗教建筑遍布的空间格局；文人墨客于宗教胜迹留下的题咏佳作，推动“八景”的教化功能随诗词流传深入民间。这种教化不苛求教义的深究，而是以开

放的祭祀礼仪，于具体场景中真切体悟市井文化、儒家伦理与道德规范，使“八景”承载的教化内涵从抽象理念变为可感可践的生活准则^[31]。这种依托特定空间场景、注重实践体悟的教化逻辑，与现代环境教育的核心路径高度契合。通过沉浸式体验替代知识灌输，让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主动感知、内化知识与理念。

5.3 “八景”空间作为教化综合体的特征与意义

不同群体在与同一处风景的互动中，会基于各自的经验背景生发出多样理解，这些个性化的阐释，逐渐凝为基础性共识，有效缓解了社会价值观碎片化问题，使得自然属性与人文的精神内核在风景中实现深度耦合，让社会教育功能突破了刻板的规训模式，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实现价值的传递。侯怀银教授提出需为传统观念、民俗、道德、礼仪赋予时代新内涵，并将其物化为社会教育载体，转化为新型德育内容^[32]。“八景”所承载的内涵使诚信、担当、勤学等儒家价值观转化为民众对个人行为准则的深刻认知，进而内化为现代社会所需的职业操守、生活规范等价值准则，为多元文化背景下民众的价值共识构建提供了历史与精神锚点。

6 结语

惠州西湖“八景”构建了“官方借水利治理塑空间、文人以审美赋内涵、市井凭游赏拓功能”的多元耦合空间教化机制^[33]。这为风景园林学提供了景观功能与教化价值协同的研究范式，又补充了社会教育史中传统景观教化的实证案例，还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辟了从历史功能挖掘到当代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本文侧重于从历史维度解析惠州西

湖“八景”的空间教化机制，对“八景”水体景观当代教育效能的评估缺乏基于使用者调研的实证数据支撑，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将进一步拓展研究，一方面对比岭南其他地区“八景”的理水实践与教化功能关联，另一方面运用问卷、访谈等实证方法，系统研究惠州西湖水体景观的当代教育效能，为其遗产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更精准的依据。

注：图1、图2、图3-b、图3-c、图4、图7源自吴莺《惠阳山水纪胜》；图3-a源自徐旭旦《惠州西湖志》；图6改绘自参考文献[24]；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 [1] 范晓鹏, 王树声, 李小龙, 等. 文教空间: 一种承载人文教化理念的规划手段[J]. 城市规划, 2019, 43(03): 76-77.
- [2] 李萍. 教育组织形式的嬗变、特点与启示——基于非制度化教育的视角[J]. 现代教育科学, 2016(12): 11-14.
- [3] 冯惠城, 唐孝祥, 苏逸轩. 古代惠州西湖风景教化载体的类型特征[J]. 南方建筑, 2024(04): 97-105.
- [4] 冯惠城, 唐孝祥, 苏逸轩. 日常生活史视野下古代岭南州府城郊风景教化载体的类型与特征[J]. 中国园林, 2025, 41(03): 146-152.
- [5] 刘黎明, 范哲林. “自然”与“文化”: 第斯多惠心理教育自然教育思想[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 16(04): 41-44.
- [6] 李自若, 郭煥宇, 李晓雪. 仓前村环境教育中景观资源的利用整合与风景园林专业的介入[J]. 广东园林, 2019, 41(05): 4-8.
- [7] 苏启敏, 贺阳. 教育哲学中自然观念的辩证发展: 从夸美纽斯、卢梭到杜威[J]. 现代教育论丛, 2021(02): 43-56.
- [8] 管宁. 中国园林审美理想的三重意蕴[J]. 学术界, 2025(08): 98-109.
- [9] 丁洁, 郑少鹏, 黄瑜. 中国当代教育需求下的适应性教学空间设计探讨——以近10年案例图解分析为例[J]. 建筑学报, 2021(S1): 151-157.
- [10] 李允. 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林广臻. 唐宋岭南州府园林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8.

- [12] 林广臻, 陆琦, 刘管平. 岭南州府园林概念的缘起与启示[J]. 广东园林, 2018, 40(01): 40-44.
- [13] 程潮. 儒学南传与岭南儒学的变迁[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03): 26-32.
- [14] 毛华松, 张兴国. 城市文明演变下的宋代公共园林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31(02): 118.
- [15] 王欣. 宋元明清公众活动的环境及设计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8.
- [16] 刘国维, 陆琦, 苏涛, 等. 明清岭南士人园林理景艺术特征解析[J]. 古建园林技术, 2019(01): 25-31.
- [17] 《文史知识》编辑部. 道教与传统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8] 唐孝祥, 冯惠城. 惠州西湖八景及其审美文化特征[J]. 中国名城, 2016, 30(01): 92-96.
- [19] 肖永明, 唐亚阳. 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9(03): 10-14.
- [20] 邓玉棠. 《惠州西湖志》考略[J]. 惠州学院学报, 2014, 34(02): 9-13.
- [21] 杨腾燕. 晚清留学对云南教育近代化的影响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20.
- [22] 林广臻, 陆琦, 刘管平. 古代岭南州府城市近郊风景的公共性研究[J]. 中国园林, 2019, 35(03): 125-129.
- [23] 严伟. 唐宋官吏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6(08): 12-13.
- [24] 肖雯静. 广东惠州西湖空间形态及其发展策略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 [25] 毛华松, 屈婧雅. 空间、仪式与集体记忆——宋代公共园林教化空间的类型与活动研究[J]. 中国园林, 2017, 33(12): 104-108.
- [26] 张友仁. 惠州西湖志[M]. 麦涛, 点校, 高国抗, 修订.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 [27] 田银生. 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28] 吴琦, 赵秀丽. 儒佛互补: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23(03): 115-121.
- [29] 杨紫荆. 明代惠州府志研究[D]. 武汉: 湖北大学, 2023.
- [30] 王美华.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8(03): 84-92.
- [31] 车如山, 崔永红. 儒家社会教育思想初探[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 10(09): 27-29.
- [32] 李绍伟. 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研究[D].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 [33] 梁仕然. 广东惠州西湖风景名胜理法浅论[J]. 风景园林, 2012, 19(03): 153-157.